



家庭計畫通訊

新加坡的提昇生育率政策

林淑慧譯

本文譯自S.M.Lee, G. Alvarez, & J.J. Palen: Fertility Decline and Pronatalist Policy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 17. No.2, June, 1991. 譯者現任省家庭計畫研究所技士。

壹、前言

在全球性普遍憂慮人口成長過速的時代裡，那些生育率正在降低的地區，理所當然的被忽略了。然而，對於人口減少這個問題的憂慮，卻是由來已久。而且，最近幾年，由於許多工業化國家已逐漸警覺到這種長期性低生育率可能產生的影響，這個問題又再度受到重視。

有幾個國家已採取各種提昇生育率的政策來扭轉低生育率的現象。法國、西德、蘇聯等國都已設立了獎勵生育制度——例如：經濟補助、減免稅金、加強兒童照顧服務、協助職業婦女等措施——鼓勵生育及減緩生育率衰退的趨勢。天主教國家如羅馬尼亞，更是嚴格限制

避孕方法的採用與人工流產的服務，以求增加各家庭的人數。然而直到今天，這些提高生育率的努力，成效都極為有限。

新加坡是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他們對於生育率降低與人口可能減少的問題，有其獨特的因應之道。歷經了 1960 年代的高生育率到 1980 年代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的鉅幅演變，新加坡政府遂改變其態度，轉而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本文係探討這項新人口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措施，及其成功的可能性。

貳、人口資料與歷史

今天的新加坡乃起源於 1819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所建的貿易港。這個小島上最初只住了幾

百個馬來人，但人口增加得相當快速（見表一）。二次大戰前，移民是新加坡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這些移民多半來自中國，少部份來自印度和馬來群島。1930年代，新加坡開始限制外國人移入，大戰之後的數十年，更加嚴格執行，1940年代以後的人口成長，主要是出生率增加的結果。

表一 新加坡人口數與人口成長率1871~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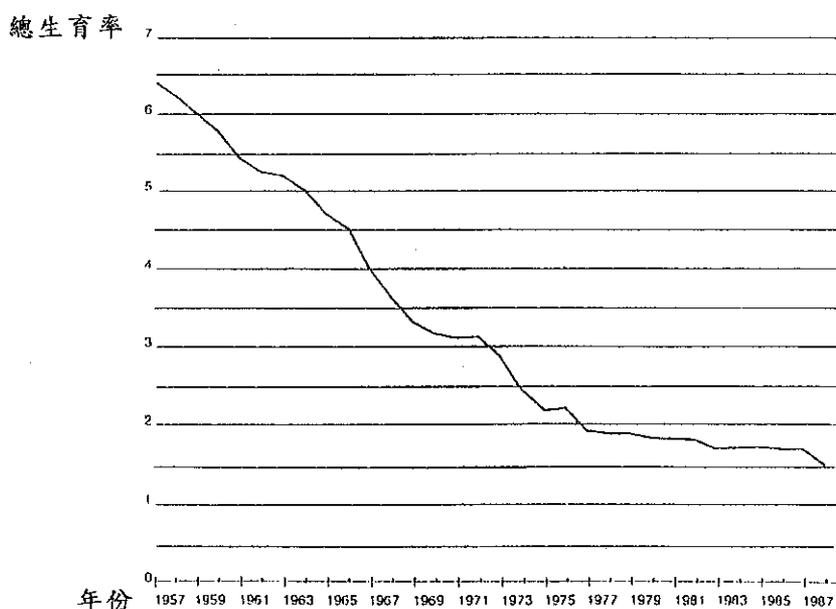
年份	人口數	成長率
1871	97,111	na
1881	137,775	3.6
1891	181,612	2.8
1901	227,592	2.3
1911	303,321	2.9
1921	418,358	3.3
1931	557,745	2.9
1947	938,144	3.3
1957	1,445,929	4.4
1970	2,074,507	2.8
1980	2,413,945	1.5
1990	2,710,819	1.1
2000	2,929,662	0.6

註：na = 不適用

新加坡共和國於1965年獨立，1960年代新加坡人口成長率超過 3%，政府當局馬上警覺到將近 200萬的人口擠在面積僅有 224 平方英里的小島上，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遂於1966年開始推行抑制人口成長的計畫，其目標是預期在2030年人口成長率達到零，並能建立二個孩子的家庭模式。

新加坡家庭計畫與人口委員會 (Singapore Famil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Board, 簡稱SFPPB) 成立於1966年，該組織大力推動小家庭的計畫。這些降低生育率的措施包括經濟懲罰，例如：第二胎以上的生產費用提高，母親的產假僅限於前二胎的生育，第三個孩子不得享有所得稅寬減額，以及減少三個孩子以上的家庭獲得國民住宅的機會（大部份的新加坡人依賴政府所興建的國民住宅，目前有85%的新加坡人居住在國宅裡，其中絕大多數是低、中收入者）。政府監控的大眾傳播工具，大力宣導家庭計畫訊息，教育部也規定學校實施家庭計畫教育與人口教育，同時在各地普設家庭計畫服務中心，並在1970年制定法令，提供低廉收費的人工流產與結紮手術的服務。

圖一顯示新加坡的總生育率從1957年的 6.5 降至1988年的 1.4 之遞減趨勢。目前新加



圖一 新加坡歷年總生育率之變化，1957 - 1988年

坡的總生育率為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淨繁殖率由1969年的1.4降為1985年的0.76；如果以這種生育率持續下去，當今這一代新加坡婦女生育來替代自己位子的女兒數會比這一代少四分之一。導致這樣的人口轉變有許多因素，包括政府的計畫、工業化，以及家庭結構與社會價值的改變。不管怎樣，1960年代末期開始的抑制人口成長的政策與計畫，已在十多年前達到其預期的目標；直到最近，新加坡已被視為一個由政府控制生育而成功的模範國家。

參、由控制生育到鼓勵生育的轉變

1983年8月14日，新加坡李光耀總理的國慶演說中，首次示意必須改變人口政策。他指出1980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教育程度較低或未正式接受學校教育的婦女，平均有3.5個子女，而大學畢業婦女平均子女數為1.6；此外，有將近16%的大學畢業婦女到35歲時仍未結婚。

根據李光耀總理所述，這樣的差異會危及國家未來的前途，因為「先天，或者所謂的遺傳，較後天的教育更能決定個人行為……，如果我們再以這樣不平衡的方式繼續繁衍下去，我們將無法維持目前的水準，競爭能力也會降低，經濟將衰退，政府蒙受損失，社會進步也將走下坡。」李總理的演說，認為教育成就可以有效地替代天生才能，而這種教育程度不同所產生的生育力差異，勢必對新加坡的優生學造成不利。

1983年的演說，李總理和其他官員雖然沒有指出種族間生育力的差異，但是政府對優生學與人口的關心，清楚地顯示了對未來構成新加坡人口種族比例的顧慮。1880年代及1900年代初期，來自中國與印度的移民造成了新加坡人口種族的多元化。目前，華人占絕大多數（77%），其次是馬來人（15%）、印度人（6%），其餘為混血種族。華人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均居領導地位。但人口資料顯示，低於

替代水準的生育模式，主要發生在華人婦女之間。所有新生兒中，華人佔69%，印度人為8%，馬來人有19%；另外，大學畢業婦女，華人多於馬來人或印度人。然而，所有的馬來與印度婦女都會結婚（不論她們是否為大專程度），華人婦女的結婚率卻很低，尤其是大專程度者。因此，對於高教育水準婦女的結婚率與生育率之憂慮，係特別針對華人婦女而言。

抑制人口成長政策是1960年代推動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主要部份，然而，1980年代新加坡面臨的不只是人口數量改變的問題，還有生育模式問題。新加坡人已傾向晚婚，且有不少人根本未婚。自1957至1985年間，男性第一次結婚的平均年齡，一直穩定的維持在28歲之際，但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卻從23.6歲遞增到25.3歲。晚婚情形與教育成就有特別顯著的關係；1985年的資料顯示，大學畢業者的平均結婚年齡最高。此外，最近的人口資料也顯示生育率與教育程度間的反比關係；大學程度婦女的平均存活子女數最少，是1.57個；未受過正式教育的婦女則有4.37個，小學程度者2.34個，初、高中程度婦女為1.59個。

由於人口變遷對政治、經濟的連帶影響，新加坡政府視人口改變為一嚴重問題。這個只有港灣而無天然資源的小島，新加坡依賴其本身的勞動力量來發展經濟，在過去二十年間，已有相當驚人的成就：1987年，國民生產毛額達7,410美元，僅次於日本，高居亞洲第二位，且較義大利與西班牙為高。另外，在衛生和其他生活品質的指標上，新加坡已做得相當完善。1987年，嬰兒死亡率為9.3‰，較美國（10.5‰）、英國（9.4‰）、西德（9.5‰）低；國民平均壽命為73歲。大多數新加坡人住在政府興建的現代化公寓，島上也有寬廣的高速公路與新穎的大眾運輸系統。

肆、政府的努力

M.S. Teitelbaum和J.M. Winter指出，政府

面臨生育力衰退時，可以下列四種方式因應：限制家庭計畫服務的取得，獎勵生育，增加移民，順應人口改變而不是試圖改變。新加坡政府已採取了透過多項的獎勵辦法，企圖影響特定群體婦女的生育率來因應人口的改變。

1983年起，新加坡政府提出幾項策略鼓勵民眾生更多的小孩，尤其是那些被認為具有理想特性的對象。然而，提昇生育率的策略出現了多次的改變，這些改變反映了政府企圖完全扭轉低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中所面臨的困境。

第一項提昇生育率計畫是1984年元月所提出的「大學畢業母親計畫」(Graduate Mothers Program)，這項計畫提供了一系列獎勵辦法，鼓勵大學畢業的婦女生更多的孩子，包括生三個或更多子女時，享有優先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機會，以及減稅優待。

這項計畫的出發點是政府認定教育成就與智商相對應的觀念，官方認為這些獎勵措施可以鼓勵受高等教育的婦女「生第二個孩子（如果生第三個更好），這樣對新加坡所關切的生育模式不平衡的問題，將有一些調整作用。」此項計畫的對象係針對教育程度較高的新加坡婦女，她們通常與有同等學歷的男子結婚。由於有16%的大學畢業婦女仍未婚，而同等學歷的未婚男士只有5%，政府因此希望能提高婦女結婚的意願。

這項鼓勵高學歷婦女多生育的計畫，同時伴隨著獎勵低收入、低教育婦女接受結紮手術的計畫。如果婦女年齡低於30歲，家庭收入少於2750美元，且夫婦兩人未完成高中教育，那麼她的結紮手術將獲得5000美元的報酬，做為購置國民住宅之用。這筆數目幾乎是一棟三個房間的國民住宅價格的三分之一，且足夠支付20%的頭期款；如果沒有做結紮手術，婦女就必須歸還這份報酬本金與10%的複利。

1985年中期，只有57對夫婦簽名同意接受這項結紮獎勵計畫，但僅40位婦女接受結紮手術。儘管成效相當有限，令人驚訝的是，這項

針對低收入、低教育婦女的結紮計畫，並未引起明顯的反對意見，這顯示一般新加坡人認為低收入者不應有太多的孩子，這種想法，到底是基於優生學或經濟的考量，我們無法斷言。

「大學畢業母親計畫」的實施結果，比政府所預期的更為引人爭議，尤其是高中程度的婦女，她們強烈批評這項計畫的受益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少數婦女（根據1980年的人口資料顯示，10歲以上的婦女只有1.8%是大學畢業生）。從報上的讀者投書，也發現這項計畫的受益群體對此項措施並不熱衷，她們不滿政府訴求的是其優秀的基因，同時對政府干涉她們的個人生活表示不悅。

1985年3月，「大學畢業母親計畫」的驟然終止，似乎是意料中的事。教育部部長譚東尼(Tony Tan)宣稱：「大學畢業母親的反應，指出這項計畫認定獎勵措施能鼓勵大學程度的婦女生更多孩子，這個前提是不可能的。此項計畫已引發大學畢業與非大學畢業婦女的焦慮與不滿，我的觀點也認為如果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就沒有理由繼續做下去。」

由於政府相當擔憂大學程度婦女的低結婚率（幾乎都是華人婦女），財政部乃於1984年設立社會發展中心(Social Development Unit, 簡稱SDU)，來提高這些婦女的結婚率。該中心策劃舞會、保齡球賽、週末旅遊、電腦研習、甚至海上旅遊（當地人稱為愛之旅）等活動，促成大學程度的未婚男女聯誼聚會之機會；這些活動，目前仍繼續實施中。此外，所有未婚並具有大學學歷的政府機構職員，必須參加婚姻與家庭之專題研討會，SDU也提供男女約會的電腦配對服務。

1988年SDU聲稱大學畢業的未婚青年中，有40%是SDU的會員（人數約7000人），且自1984年成立以來，已撮合了500對的青年男女結婚。該中心副主任以下述談話總結了SDU的活動：「如果要製造天才，就必須讓大學程度的男士與同等學歷的女士結婚。」

儘管先前獎勵生育的計畫並沒有成功，新加坡政府仍繼續其提昇生育率之政策。1987年，新加坡政府公佈了新的鼓勵生育辦法（持續到1989年），這些措施以「供給能力」的措詞為口號（例如：如果你負擔得起，就生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先前強調的高學歷母親計畫也告結束。但是，「新」獎勵生育辦法與舊辦法到底有什麼差別，則不是很清楚，因為學歷較高的高收入民眾依舊是新辦法中鼓勵生育的對象。

新辦法中同樣包含了經濟補助。例如：三個孩子以上的家庭，享有一萬美元的退稅優惠，期間長達五年之久。若為職業婦女，則給予相當年收入15%的退稅優惠，最高金額可達5000美元，同時提高第三、四個子女的所得稅寬減額，第三胎以上的生產費用由政府補助。

除了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外，生育三個或更多子女數的家庭，可享有優先為子女選擇學校註冊與登記國民住宅的權利（等候國宅的期間通常可從二個月至二年不等）；政府並補助兒童照顧費用；政府機構下的女性員工得享有延長產假的權益。新獎勵生育辦法中的退稅優惠，在1990年的預算是給予一萬美元的退稅額，對28歲之前即生育第二胎的婦女而言，享受累計退稅的有效時間為七年。第一、二胎的間隔時間愈長，補助額度愈小。這項策略係試圖藉由獎勵較早生育的家庭，來勸阻婦女延遲生育的意向，以達成提高生育率的目的。

伍、未來人口之推計

1983年人口政策的第一次改變，政府的理由是顧及下一代的遺傳品質。1987年人口政策改變的理由則包括了新加坡的道德特質、經濟成長、人口老化與種族平衡等顧慮。有關鼓勵生育計畫的道德內涵，李光耀總理形容口服避孕藥的出現，是造成西方國家人口衰退的催化劑，他說：「口服避孕藥發明出來時，被認為是一項人類的福祉，我們引進口服避孕藥，並做為家庭計畫的處方藥。然而，它卻導致西方

國家的性犯濫，使家庭管束孩子的功能瓦解，而你所處的是一種新的、單親家庭的社會。」

由控制生育到鼓勵生育的轉變，可說是政府在避孕服務與家庭計畫角色的成長，但必須再審議人工流產政策。自1970年起，與懷孕數相較之下，人工流產數呈穩定性的增加，當時只有4%的懷孕由人工流產終止。但因人工流產服務不僅容易取得且費用低廉（公立醫院做一次人工流產只花費2.5美元），到了1985年，已有36%的懷孕是由人工流產終止。然而，到目前為止，新加坡政府並未做出任何影響人工流產政策的決定，雖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工流產婦女是新加坡提昇生育率行動的潛在對象，而且想要對人工流產加以限制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由於人口老化及不平衡的年齡結構對經濟成長與勞動力量可能產生的連帶影響，更支持了提昇生育率之政策。我們以三種生育率的假設，推計人口數量與年齡分佈的變化（見表二）。如果持續目前低於替代水準的生育率，人口會繼續增加，然後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開始減少。這三種推計指出，2030年時，人口數可能在300萬（假設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至340萬之間（假設生育率維持在替代水準的狀況）。

目前新加坡的生育規範是兩個孩子恰恰好，如果從現在開始，每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小孩，那麼15歲以下的年輕人口，將維持相當穩定的數量。如果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15歲以下的人口，在1985年與2050年間，至少減少43%，且自1990年代起，這個年齡層的人口數即開始減少。

假設生育率維持在替代水準，59歲以上人口的百分比，預期由1985年的7.8%增至2000年的10.5%，到了2050年，更提高到22%。如果以低於替代水準的生育率推估，那麼老年人口所佔的百分比將會更高。

為了維持足夠供養老年人口的勞動力量與保有現階段經濟發展成果，提昇生育率的政策

表二 依三種家庭子女數之假設，推計新加坡人口總數(千人)，15歲以下人口數(千人)與59歲以上人口百分比，按年份分：

年份	2個小孩			1.5個小孩			1.3個小孩		
	總數	<15	≥59	總數	<15	≥59	總數	<15	≥59
1985	2,558	624	7.8	2,558	624	7.8	2,558	624	7.8
1990	2,703	621	8.5	2,691	609	8.6	2,686	604	8.6
1995	2,850	659	9.3	2,809	618	9.5	2,789	598	9.5
2000	2,987	682	10.5	2,900	595	10.8	2,858	553	11.0
2005	3,102	681	11.5	2,961	552	12.0	2,896	492	12.3
2010	3,191	660	14.2	3,000	509	15.1	2,911	440	15.5
2015	3,266	642	17.4	3,018	481	18.8	2,905	410	19.6
2020	3,328	643	17.4	3,014	468	23.3	2,873	393	24.4
2025	3,372	660	23.8	2,979	457	26.9	2,807	374	28.5
2030	3,391	671	24.5	2,912	438	28.5	2,708	346	30.6
2035	3,382	669	24.4	2,814	412	29.3	2,577	315	32.0
2040	3,358	659	23.2	2,698	387	28.9	2,429	288	32.1
2045	3,332	651	22.4	2,577	368	28.9	2,275	268	32.7
2050	3,317	654	22.0	2,460	355	29.3	2,125	252	33.7

乃顯得益發重要。新加坡政府打算在1992年之前廢止外籍短期勞工的雇用，這些外籍勞工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印尼及斯里蘭卡。1980年代中期，外籍勞工人數超過15萬，大約佔了當時勞動人力的12%。雖然外籍勞工的耐力較大，但政府仍擔憂這些外籍勞工可能會造成政治與社會上的分化事件。經濟層面的考量加上對人口老化問題的憂心，提昇生育率的主張遂更具說服力。

或許新加坡提昇生育率的關鍵因素是種族問題，1983年，首次公佈高教育程度婦女的低生育率情形，可清楚地看出，種族問題是一項嚴重卻未明白表露的顧慮。1986年底，李光輝總理的演說中指出，「這個問題」是華人未能

生育足夠的子女來替補他們自己。從那時起，政府官員便較直接地提到種族因素。1987年，第一副總理湯國壽(Goh Chok Tong)公佈人口政策是以供給能力為基礎，他說：「過去十年，馬來人的生育率是2.1，能替補自己；印尼人的生育率則在1.9至2.1間上下波動，也幾近替代水準。但是華人的生育率在過去十年間卻掉了下來，現在已降到1.5，將來可能會更低。因此，問題的根源是出自華人的社會，他們未能生足夠的子女數來替補自己。」

因此，儘管所有的新加坡人依其生育子女數，均有資格享有該國獎勵金額最高的退稅優惠，然而，華人顯然是鼓勵生育計畫中的主要目標群體。財政部長胡理查(Richard Hu)更明

確地指出，「延遲生育的現象，在高學歷者的身上尤為顯著。」故1990年鼓勵提早生育的計畫，是一項試圖說服華人生育更多子女的策略。

陸、對鼓勵生育政策的反應

新加坡政府自信這些有關種族的明確聲明，不會引起各種族間的緊張情緒。自新加坡獨立，首任總理李光耀上任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整個國家。李光耀在1990年辭職後，特別選派湯國壽繼任他的位子。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與所有政治、經濟、社會等政策一樣，都是「由上而下」制定與執行的；換句話說，也就是高階層的政府官員（尤其是總理）在宣佈新政策之前，並未充分考慮一般民意。

除了政府主管的新聞單位所發佈的資料外，很少有系統的調查有關新加坡民眾對最近轉變的人口政策與計畫之態度，而這些資料對考量新人口政策的成效與未來人口變化的趨勢，相當有助益。1983年至1984年間，有一項立意取樣的調查研究，訪問了399位新加坡的大學生，藉以瞭解這些年輕人對這項新人口政策的態度與反應。下面的資料是研究對象中有關華人（佔全部樣本的93%）的回答情形。

370個華人中，有91%表示有生育子女的意向；超過83%的回答者認為婚姻是必要的。男、女相較之下，有較多的女性肯定婚姻的必要性（88%的女性對78%的男性）。這項結果顯示婚姻與生育仍是華人大學生的規範。如果把這項有關婚姻與生育的態度外推到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可以清楚看出大學程度婦女的低結婚率，未必全是自願的。

在這些有生育意向的研究對象中，大部份的回答者希望生兩個孩子（56%），也有34%的人表示希望生育二胎或更多，只有22個學生無生育意向，有12個學生只想生一個孩子。因此，超過十分之九的回答者希望至少有二個或更多孩子；回答者的性別與理想子女數並無顯著差

異；且幾乎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回答者表示婚後兩年才生第一胎。

男、女性相比，男性在婚後較可能馬上生育（31%的男性比21%的女性）。整體看來，高學歷華人將來的低生育率情形，並無法從研究對象的生育意向看出任何端倪。

對大多數受高教育的婦女寧可選擇單身也不願下嫁學歷較自己低的男士，政府常表憂慮。本項調查顯示，這種情形不太可能會有明顯的改變：大部份的男性回答者（47%）表示他們希望配偶的教育程度和自己相等；也有幾乎相同比率的女性回答者看法與男性一致（40%），但有38%的女性希望配偶的學歷較自己高。另外，大約有13%的男性希望配偶的學歷比自己低，但是卻沒有一位女生會這麼想。

大體上，研究對象對SDU策劃的活動不太關心（54%），只有20%的回答者贊同SDU的活動，另有18%表不贊同；男性較女性能接受SDU活動（26%對17%）。如所預料，沒有結婚或生育意向者，對SDU活動的態度最負向。

超過二分之一的回答者有意願參加SDU多樣化的活動，例如：戀愛與婚姻之專題講座、學生社團與假日旅遊活動。回答者的性別與參加活動的項目並無顯著差別。回答者對電腦配對的約會活動卻裹足不前，將近55%的回答者不願參加這項活動，女性的態度明顯地較男性負向。有64%的女性表明不會利用這項服務，男性意見的分佈則較平均。對配對結婚的看法，絕大部份是負向的，有80%的男性和女性表白喜歡自己選擇結婚對象。

雖然這些結果來自有限資料，但整體看來，仍顯現大部份高學歷的華人有結婚及至少生育兩個孩子的意向，也有意願參加能結識異性的SDU活動。然而，就實際約會與配偶選擇，卻不願接受政府的安排或控制。至於他們是否能被鼓勵生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則需要靠其他資料及一段時間之後才可獲悉。

柒、結 論

這項調查指出，新加坡大學生的理想子女數及結婚意向與已大學畢業者（大部份是華人）目前的實際行爲並不一致。從研究對象的回答意見，也提供了廣泛的證據支持婚姻與兩個孩子的生育規範。然而，新加坡最近的人口趨勢顯現的是，晚婚、未婚人數增多，以及有不少家庭未生或僅生育一胎的現象，這種趨勢在40歲以下的大學程度者尤其明顯。這些大學生畢業之後，面臨婚姻與生育事件時，也有可能與現在已大學畢業者的行爲一致，因此，低生育水準的現象仍將持續下去。

新加坡的例子，說明了國家在面臨生育力衰退時，可採取多樣化的選擇來因應；國家人口從高生育率快速地降到替代水準之下，人口政策隨之明顯轉變，這種轉變深具意義。儘管1983年開始的鼓勵生育計畫成效極為有限，但新加坡政府確信能說服民眾重新考慮他們對子女數的態度。由於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抑制人口政策，在降低生育率的成果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因此，新加坡政府也深具信心，確信新人口政策能提昇生育率。

現階段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及計畫究竟是會成功或者失敗，尚難定論。儘管我們認為這些計畫不太可能達到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目標。過去控制生育的非常成效，可能是新人口政策的

最大阻礙因素。大部份的新加坡人已樹立了兩個孩子恰恰好的生育規範，目前呼籲多生孩子的訴求，是針對逐漸富裕與消費導向的社會，新加坡人可能不希望生太多孩子而降低了原有的生活品質，經濟補助對已相當富裕的夫婦來說，也不具有什麼意義。

此外，婦女已是勞動市場的主力，婦女的高勞動參與率通常伴隨低的生育率，除非婦女勞動參與情形有戲劇性的改變（但是並沒有任何指標顯示這種可能性），否則生育率不太可能會增加（尤其是高學歷與經濟條件不錯的婦女）。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經驗頗具參考價值，這些低生育力的國家，也沒有任何徵兆顯示有可以改善生育力衰退情況的社會變遷。

低的期別生育率並不會自動地導致低的世代生育率，婦女可能因晚婚或使用有效的避孕方法而延遲生育；但是，如果這一代與未來世代的新加坡婦女在生育年齡時仍維持晚婚或延遲生育，那麼生育率低於替代水準的現象將持續下去。新加坡政治領導者在人口政策上的難題是，如何找出一項有效的方法，使新加坡人自覺生育更多的孩子是個人而非國家的利益。目前，新加坡政府並不認為開放移民是維持人口成長的辦法，那麼，依賴獎勵措施求取生育率的提昇，可能還要努力許多年。無論如何，歷史告訴我們，因應生育率的轉變，需兼具謹慎與耐心。